

动荡中的生机

漏卮在哪里？

虽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清王朝中还很少有人能觉悟到西方人的闯入将会使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巨大的变化，将会酝酿出一个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但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朝廷内外都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一种越来越迫近的危机。曾经以地大物博、富有四海的中华帝国，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的穷国。中国的财富到哪里去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都有人在想这个问题。黄爵滋在他著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说：

“臣维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清高宗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

黄爵滋的疑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按照传统的理财观念，国家开支不过分增加，民间生活不过分奢侈，社会财富是不应该减少的。“漏卮”的概念早在汉代已经产生。卮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古人很形象地把国家的支出比作一个个酒杯，哪部分耗费过度，那里就是漏卮。汉代政论家很重视漏卮，有“川源不能实漏卮”^①之

^① 《盐铁论·本议》。

说 认为即使能广开财源 不堵塞漏卮 国家绝不可能富强。

堵漏卮思想很适宜封建时代的中国历代财政改革家大多以此作为理财要点，因为长期停滞不前的生产力已经使“地力之生物有大数 人力之成物有大限”，^① 开源无望，唯有节流。不过，以前人们所注意的漏卮还只局限在国内，诸如帝王侈糜、富豪挥霍、冗官冗兵、寺观僧尼等等，十九世纪以后的漏卮却口向国外，而且裂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裂口向外的漏卮动摇帝国的根基 不能不令人心惊 道光年间清廷内部的争论正是围绕如何堵塞漏卮这个重大的主题而展开的。他们之间其实还没有明显的爱国与卖国之分野，充其量只是糊涂与清醒，保守与开放，顽固与变通之别。没有人想否认漏卮的存在，但对漏卮到底在哪里，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补救，却有不同的认知深度。

比较浮面的看法是漏卮在洋货，这是生活在十九世纪初的所有中国人都很容易感觉到的。管同有一篇《禁用洋货议》，表达了最极端的观点。他说：“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裼蹶而从时尚。夫洋之货胡为而至于吾哉？洋之货十分而入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入洋者三矣。……而中国之困穷，固由于此，则安可不为之深虑也哉？”^② 管同的观点得到朝廷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赞同，他们主张全面禁止对外通商，闭关自守，以养护中国的财力。这部分人我们已习惯称之为顽固守旧派，他们的观点自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是，有不少被我们称之为进步思想家的，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龚自珍在林则徐南下禁烟时，作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相送 文中把漏卮分成“食妖”和“服妖”。食妖指鸦片 服妖指其他各

①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② 《因寄轩文初集》。

类洋货。他建议除禁烟外“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

林则徐等禁烟派也把洋货大量输入看作漏卮，不过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把鸦片和其他洋货区别对待。鸦片是大漏卮，洋货是小漏卮，大漏卮必须禁绝，小漏卮可以暂不计较。黄爵滋批评“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的策略，认为正常的中外贸易“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之穷，完全在于鸦片贸易“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必须禁止的不是通商，而是鸦片。林则徐支持黄爵滋的意见，他按照吸食鸦片的人每天要多支出银一钱去推算，认为“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万万两”。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林则徐认为，以往的漏卮和现在相比简直无足轻重，国内有再大的漏卮也不可怕，“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①

同样认为漏卮在鸦片的弛禁派也惊呼，鸦片贸易“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但是他们对鸦片毒害人的身体毫不担心，反而说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断无减耗户口之虞”。他们只为鸦片造成的白银外流担忧，表示“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因而他们拿出的对策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②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政府有收入，白银不外流，其他的问题全可置之度外。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主张“开种鸦片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挡外夷所入，积之渐久，不致纹银出洋”更是荒谬透顶。

鸦片战争的结果使各种堵塞漏卮的设想都归于失败。漏卮越来越大，中国的白银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外流。无可奈何之下，清政

《林文忠公政书·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端片》。

② 《许太常奏议·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府只能听之任之，其结果却发现漏卮对政权的危害并非想象的那样大，政府完全可以把损失转嫁给庶民百姓。于是，堵塞漏卮的努力很快变成解决“银荒”的闹剧。1853年清政府首次发行户部官票，代替银两流通，接着又发行大清宝钞，代替钱币流通。两种钞票都不能兑现，政府不必再为银钱的减少而犯愁。增铸大钱也在1853年开始，从“当十”至“当千”种类繁多，轻重不等。发行纸币和大钱使清政府获得了六千余万两的额外收入，付出的代价是使货币制度陷入混乱，国内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伤害。

类似的转嫁损失措施还有田赋借征、田赋附加、厘金，及各种各样的勒折浮收。外贸逆差越来越大，战事耗费越来越多，战争赔款越来越巨，清政府似乎也越来越能应付裕如。然而中国越来越穷，越来越弱是明摆着的事实，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不会不感到痛心和焦虑。问题是中国传统的财富观念、理财思想积累得太深太厚，不摆脱它们的束缚，要找出一条能使中国富强的道路几乎不可能。

告别传统的漏卮思想或许是寻找新的富国之道必须迈出的第一步。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大声疾呼告诉人们：“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也！”^①这不只是为禁烟派辩护，也是对禁烟过程的检讨。他认为清政府最大的失策莫过于决定断绝一切中英贸易。魏源指出，中英贸易“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人无出”。它不但不是漏卮，反倒是中国的利源。中国应当扩大进出口贸易，在贸易中给外商减免税收、裁除浮费等优惠，外国还可以通过提高对华贸易商品的关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这样，“夷必乐从”。

魏源所说的“鸦片旧额”正是战前让人痛心不已的巨大漏卮，此时他的着眼点已不是补漏卮，而是用正常贸易去替代鸦片贸易，

^① 《海国图志·筹海篇四》。

因为正常贸易对中国并非无利。旧额可以让给外国，外国列强贪图的就是厚利，满足了他们的利欲，停止鸦片贸易就容易办到了。魏源的想法虽然有些天真，但是，他毕竟把人们的思想从“漏卮在洋货”引开了去。接下去便是“师夷长技”“通商制器”，一条新的富国之道在云雾深处渐渐露脸。

使漏卮变成富源，必须向致害的源头——西方各国去学习取经。这是令许多中国士人痛苦而又彷徨的事。冯桂芬曾经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① 承认落后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但是，为了寻求富国之道，冯桂芬忍受了，而且提出“宜日鉴诸国”，向西方各国学习的口号。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治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② 冯桂芬的结论是：西方富强的根源在其先进的技术，中国只要学到西方的技术，不难走上自强的道路。他的这些思想对中国近代的洋务活动有过很大的影响。

王韬在 1859 年还认为“仿行西法”，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到 1865 年却成为中国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其中他个人的奇特遭遇有一定影响，但主要是到香港、英国后，对资本主义有了更直观更透彻的了解。他发现国内好不容易下决心接受的西方技术，其实只是“富强之末”，而富强之本却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是中国最难学习的。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抛弃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举起重商的大旗。他指出“西方恃商以为国本”，“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③ 他认为清政府对商业的

①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②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③ 《弢园文录外编》卷一〇、卷四。

态度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对商业认识的改变，使王韬对漏卮的态度也和以往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差别。王韬对中国财富的流失仍非常关心，但是他不再把堵漏看成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商业把财富留住，甚至增加得更多。王韬理解的商业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几乎包含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西方新式工矿交运事业。他认为，“西人自入中国以来，所有良法美意足以供我观摩取益者，指不胜数”。只要认真仿效 这些事业都能“兴大利”；“诸利既兴 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王韬特别看重发展机器采矿业，认为“利之最先者曰开矿”。中国传统手工业中有采矿业 历史久而规模不大 主要是为维持农业社会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而存在。明清以后，铜、银开采有所增加，主要是为了解决币材。所以，当用机器大规模采矿的方法传入中国时，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诸如破坏风水、骚扰民间、夺人生计等，都成了反对机器开矿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开矿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满足需要上，根本没把它作为一种致富求强的途径。王韬写了许多文章批驳这些观点，着重强调开矿的大利。他指出，英国正是“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中国开采的煤铁多了，不但可满足国内发展其它新式工业的需要“，而亦可售之于西人 以夺其利”；“中国既有煤铁 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也无如何我，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①

从“堵漏卮”到“兴大利”，王韬对社会财富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王韬已明显地感到国际商业竞争的作用，他多次强调应该优先发展能与外国竞争的行业，如开矿、轮船和纺织，提高中国商业的竞争能力，一定会取得惊人的效果。对此王韬信心十足，他

《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在 1875 年写给丁日昌的一封信中说道：“设使一旦通商之利为我所夺，则其煤铁机器之用，布帛制造之物，消流日狭，而工贾必多失业。外既不振，内且有变，而印度一隅，不几势成孤立，或恐作瘦狗之噬，困兽之斗，且奈何！”^①王韬认为中国能够通过贸易竞争轻而易举地打垮英国，近乎白日做梦。但是，他提出的发展工商业以求富国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一思想由郑观应以更明确的“商战”号召，激动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实业家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其实也是从“漏卮在洋货”思想中蜕变出来的。他指出，几十年来外国发动的商战比兵战对中国的损害更大。使中国受害的洋货，“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他特别感慨那些“种类殊繁，指不胜屈”的洋杂货，它们“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足可以看出“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而中国方面应战的武器，只有丝、茶，及种类不多的土货。“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此外，外贸中使用洋钱。“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虚长洋价，换我足宝”，他认为也是“绝大漏卮”。

但是，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停止在发现漏卮，感叹漏卮，而是采取逆向思维找出了漏卮的可利用一面。他说：“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

^① 《弢园尺牘》卷九。

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

既然外国以它的商品优势来攫取我国财富，我国也可以改进工艺技术，以同样精巧的商品抵制洋货。他认为，如能做到“其物同，其价同，其美恶同，而中国之人犹有舍华商而就洋商者。无是理也”。和王韬一样，郑观应也把日本看作一个商战成功的榜样。日本“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结果许多商品“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①，外贸收支由亏转盈，漏卮不堵自灭。这正是中国应该学习的。郑观应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说：“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权利，以塞漏卮。”^②

曾在 1876 年留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马建忠对于漏卮问题也有自己的研究。他指出：“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关注点仍然在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如何实现出口货多，进口货少，使中国“财不外散”？马建忠在西方重商主义思想中拾取了关税保护理论，认为应该学习“外洋恤商之策，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在无法取消不平等的关税协议之前，先应减轻厘金的征收。此外，他认为中国还要努力发展能抵制洋货的产业，“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③。

陈炽也很重视进出口贸易中“外泄之利源”。他在《续富国论》中指出，中国出口的货物都是“生货”，即都是初级产品，“取值至贱，获利至微”，而进口的商品都是“熟货”，即都是工业制成品，“一

① 《盛世危言·商战》。

② 《盛世危言后编》卷八。

③ 《适可斋记言·富民说》。

物之值 贵至万千 ”。 “以贱敌贵 以粗敌精 ”中国吃亏受损不可避免。陈炽认识到外贸差额的原因不单在进出口货物的数量，更在于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剪刀差，显然比马建忠更深一层。因为利用价格剪刀差，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不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方法。陈炽认为 “通商而后 洋货充斥 既不能禁民之不用 又不能禁彼之不来 而工作不兴 商情日 蹙 ”如不思改变 必定导致 “民贫国蹙 仰息他人 ”的结局。他建议采取的方法，就是在各地设立商政局 “凡华民喜用之洋货 一律纠股集资 购机仿造 以收权利；其中国所产行销外洋者，亦加意讲求 务极精美。仍仿泰西规则，有能自出新意制成一物，有益民生者，准上之工商二部，赏给护照宝星 许其专利 以开风气 以复古初。出洋诸生 学成归国 就其所习 分饬主持 ”。对于洋货造成的漏卮 只有用引进机器 大量制造工业品去对抗。陈炽从中外货物价值的差异中，隐约感到创造发明的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实行专利保护制度和重用留洋学生，明显的就是希望增加中国产业中的科技含量，使 “生货 ”变为 “熟货 ”。他认为中国只要这样去做，一方面能 “自开其源 ”利用我国的资源优势 “开矿殖货 通商惠工 出我什一之藏 已足给其求而养其欲 ”；另一方面能 “自节其流 ”自制洋货 “减税以敌其来 则西人服用奢华 大利终为我夺 ”。^①

郑观应因痛心漏卮而激发起进行商战的思想，又从进行商战产生出投资实业的决心，完成了他从一个洋行买办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心理转换过程。陈炽从感叹进出口货物的精粗贵贱发现西方工业技术先进的伟力，进而提出自强不息的维新改良主张，完成了他从一个朝廷部官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心理转换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中，“漏卮”一词已增加了许多新的含义，外贸逆差只是漏卮的一种表现，而国内生产部门的落后和缺乏

① 《庸书外篇·考工》，《自立》。

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堵塞漏卮的主题变成要发展以先进的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商业，收回被外人夺去的利益。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对待漏卮的积极态度，中国的希望也唯有在此。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正是在这种主基调下一步步展开的。洋务派官僚兴办机器工业的动机虽然复杂，但“堵塞漏卮”往往是他们驳斥反对者最有力的依据。1885 年左宗棠建议在台湾创办机器制糖业时指出“采用洋人机器制糖的方法，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①李鸿章在 1878 年要求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说，“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越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权利。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②张之洞在 1889 年申述兴建新式炼铁厂的理由时提出，“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臣愚以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③他们都把创办新式工业企业作为堵塞漏卮的有效手段。

民间私人工业资本的兴起，最大的动力自然在于利润，但“抵制外货，收回权利”的目标常常赋予他们更大的激情和勇气。张謇在陈述“设厂自救”的原由时说：“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损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④核心不外是堵漏保利。棉纺实业家穆藕初表达得更明确，他说：“我国进口货以棉纱布为大宗，

① 《左文襄公奏稿·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议·试办织布局折》。

③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筹设炼铁厂折》。

④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非但外来之棉纱布岁吸我巨额金钱，且更有向我市场采办我国棉花，加工制造，仍旧运入我国市场以网罗厚利者。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又我棉业界最羞耻事，亦即我举国人民最痛心之一事也。”他认为：“苟长此以往，不图补救，全部仰给之数姑不备论，即此进口棉货一项，已足竭我膏血，绝我命脉，是以振兴棉业不但于平民生计上有密切关系，而于全国经济上亦生莫大影响。故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亦所以救国，非虚语也。凡我爱国志士，安可不急起而力图之乎？”^① 急起力图振兴棉业的动力在于制止利源外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与英美烟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打出“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的旗号，争取社会民众的支持。他们的宣传物说：“窃维香烟一物，已成日用所必需。舶来吸我利权，岁计七、八千万。递年增广，尤未可量。若大漏卮，莫此为甚！”他们向人们呼吁：“即系日中用一烟支之微，亦要认明唛头乃可照买。因‘双喜’之唛全系完全中国之土货，可知振兴土货之好处。……凡我社会之人定然要将日中所吸之烟枝全向‘双喜’唛之货购取，即如日中所吸烟者吸‘双喜’，见人买烟者劝买‘双喜’，所谈者谈‘双喜’。”^② 要人们把吸国产烟与爱国救国联系在一起。当全国人民都明白漏卮到底在哪里，并把堵塞漏卮变为共同一致的决心时，中国民族工业的生计无疑会更加宽广。

① 《穆藕初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91、90 页。

②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99-102 页。

红顶商人的末路

1875年，光禄寺郎中刘锡鸿向洋务派发难，反对中国自造轮船时说：“若中国如伍怡和等巨富余力可兼及此者良不多觐，其他家资十万以至数十万，自有本土田宅店肆，可以衣租食税，履坦途以为安，必不肯舍孤注以临不测。”^①刘锡鸿的顽固守旧是出了名的，他提出的反对理由总体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指出那些有本土田宅店肆的富裕商人不会孤注一掷，去投资新式工业却并非信口雌黄。因为把依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式工业移植到中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风险，习惯于传统方式经营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一方面是不愿意冒险，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有适当的财力和能力去投资这些行业。那么是否只有刘锡鸿所提到的伍怡和等巨富，才是新式企业的可能投资人呢？事实却并非如此。

刘锡鸿所说的伍怡和，即指广东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它在伍秉鉴（敦元）、伍崇曜（绍荣）父子主持期间达到鼎盛，一度被视作天下巨富的象征。广东十三行行商是一种官商，是经国家授权的特许商人。清王朝虽然没有放弃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对官商却是例外。清代的官商最重要的是盐商和行商，他们曾经积累起巨万财富。如果单从资本要素来考虑，似乎完全具备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实力。考察这两种商人的兴盛和衰败，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投资理

^① 《刘光禄遗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

念中的传统因素是很有意义的。

盐商自古就是令人羡慕的行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点到先秦可数的几个大富翁，其中就有盐商猗顿的大名。明中叶加强食盐专卖制度，改行纲法，政府将一部分商人特殊化，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入行盐纲册，册上有名者发给专卖凭证——根窝 每年可按照窝本核定数额领取盐引 运销食盐 册上无名者 不得参与。清代沿袭明代的纲法。在康熙年间，当社会安定经济复苏以后，取得食盐运销垄断权的盐商很快成为最富裕的人物。

清代“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① 因而大盐商多出在两淮，集中在扬州。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说：“扬州繁华以盐盛 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 当为一百六十九万 有奇 归商人十数家承办 中盐有期 销引有地 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 场价斤止十文 加课银三厘有奇 不过七文 而运至汉口以上 需价五六十不等。”按照这样计算 经营食盐运销 转手之间可取得二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这种利润得到政府专卖制度的保证，风险很小，无疑是当时最有吸引力的投资。为了便于管理，政府又从众多盐商中挑选家道殷实的十几人到二三十人为总商，向政府承担按额交齐每年盐税的责任，代政府行使管理散商、督催盐税的职权。专卖制度下的食盐运销本来利厚，总商有代管众商的特权，借势用权，刻剥散商，可获取更丰厚的利益。总商的资产往往以千万计，而且大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国家赐予的官衔、顶戴 集财富、特权、荣誉于一身。

清代盐商的专利权虽然是世袭的，但是厚利诱人，便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想挤进这个特权圈子。乾隆年间最有名望的总商鲍志道就是一个从圈外挤进圈内，从底层爬到顶端的成功者。鲍志道虽然出身商宦世家，但到他那一代已经家道中落，他的兴起全靠自己

① 《两淮盐法志·序》。

奋斗。他十三岁离家出走，去鄱阳学会计，几年后到金华贩卖浙盐。二十岁时还只是个依附在一家扬州大盐商门下谋生的小伙计，“后自操其赢，所进常过于所期，久之大饶。遂自占商数于淮南，不复佐人故事”。^①

鲍志道贫困时选择盐商这条道路，致富以后则以挤入缙绅行列为目标。总商虽然不是正式职官，但责在为官府效力。鲍志道任总商二十年，兢兢业业，成绩斐然。他处世为人又以程朱理学为规范，勤俭治家，乐善好施，赢得极好的声誉。国家每有大事，他总是率领众商积极筹款捐资，多次受朝廷封赏，加顶戴一级。为了从官商变为真正的朝廷命官，他倾力培养次子鲍勋茂，使儿子中举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兼军机行走，成为特权官僚阶层中的正式成员。成功以后的鲍志道似乎有意让他的家族逐渐脱离盐商的俗圈。据记载，嘉庆之后，鲍氏子弟已没什么人经商，更没有出名的大盐商。

鲍氏家族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比较普遍的投资观念和价值观念。投资商业虽然是发财捷径，但发财只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标在于有朝一日厕身社会的最高层，成为缙绅士族中的一员。人人羡慕素封，获得素封的富商更企望得到实封。两淮盐商积聚起的巨额财富，多时大约有七八千万两，与清王朝全盛时期的户部库银不相上下，但是这些财富却很难找到合理的出路。这些财富的大部分不需要再回到生产流通领域，因为每个盐商的专营权是限定的，而且大盐商主要是通过转卖专营权坐享厚利，根本不需要追加投资。当我们太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成长时，资本没有出路，不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素吗？

没有出路的资本只能大量地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最引人注目的是盐商个人和家族的奢侈享乐。盐商的穷奢极侈连皇帝也感到吃惊，雍正皇帝在上谕中说：“朕闻各处盐商内实空虚

① 《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

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優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贝珠，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①雍正皇帝的指责其实并非痛惜社会财富的浪费，而是对盐商“越礼犯份”的恼怒。相比之下，乾隆皇帝比他大度得多。他巡游扬州，盐商“争自输金为御供，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使他非常适意。回京以后，有皇子贪睡误了早读，他竟责备说：“汝欲逸乐，何不作淮南商人子，而必生吾家耶！”^②乾隆虽然对盐商的豪华奢侈表示宽容，但并无褒扬之意。道光中，盐商已经衰落，奢侈程度远不如前，但人们仍把盐价的暴涨归咎于“商人服食奢靡，积惯成习，身家所费，已无限量”，^③认为他们的这些费用都被加到盐价上去了。

生活消费耗去了盐商大量资财，但更大的耗费却在用于买官爵功名，向政府捐输和报效。凡有赈灾、军需、庆典，淮商往往踊跃捐输，数额达数十万至数百万。政府则还以各色等级的翎顶补服，鼓励盐商继续为国家分忧。空名虚爵对商人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反倒刺激起政府的贪欲。嘉道时政府财政恶化，捐输变成强迫，更有名目繁多的报效及官吏的无名勒索，使财力雄厚的盐商也穷于应付，疲惫不堪。当 1832 年和 1850 年两淮先后实行票法以后，失去了世袭垄断特权的两淮盐商一败涂地，一个庞大的资本集团很快冰消瓦解。

行商和盐商一样，也是曾经煊赫一时的大资本集团。行商的历史没有盐商久远，清王朝建立行商制度的时间大约在 1686 年。它被作为与政府开放海禁，设置粤海关的配套制度而强制执行。

① 《清朝文献通考·征榷考》。

② 《国朝遗事纪闻·高宗南巡遗闻五则》。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九。